新闻发布厅

央行在人大记者会上回应金融改革与发展热点——

总量调控松紧适度 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刘辛未

3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陈雨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3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等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刘辛未摄

“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与去年相比，这一表述中少了“保持中性”四个字，这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基调改变？对此，易纲回应称，“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

在易纲看来，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从3个方面去考量。从总量上看，要体现逆周期调节，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松紧适度意味着，要让广义货币（M_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大体上与GDP名义增速保持一致；从结构上看，要更加优化，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此外，稳健的货币政策还要兼顾内外平衡。“当然要以国内的经济形势为主来考虑，但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经济，考虑货币政策时要兼顾国际。”易纲表示。

最新的金融数据也显示，货币政策在稳健基调上强化逆周期调节。“社会融资规模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为2019年经济金融开局提供了保障。”易纲说。3月10日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5.3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05万亿元；前两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4.11万亿元，同比多增3748亿元。易纲强调，一定要把观察货币信贷数据的时间拉长一些看，才能比较全面地判断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

票据融资增加不是“空转”

今年1月份，票据融资增加较多。有观点认为，票据融资和结构性存款之间形成了套利，是在金融体系内“空转”。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票据融资显著增加，表内票据融资和表外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分别新增5160亿元和3786亿元，二者合计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19.3%，较去年同期上升13.5个百分点。

“票据贴现还是支持了实体经济，主要支持的还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易纲认为，1月份票据融资增长较快有季节性因素。如果看平均值，票据融资并没有大规模空转或套利。“少数银行、个别客户的个别现象，不排除是存在的。”易纲表示。

“中小企业通过票据融资显著降低了成本。”潘功胜也认为，票据融资的增加主要是支持了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票据融资的特点是期限短、便利性高、流动性强，一般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前段时间，票据贴现利率持续下行，企业通过票据融资的意愿增强。

潘功胜表示，票据融资和结构性存款之间的套利是个别行为，结构性存款利率和票据融资利率之间的套利空间也非常有限，“这不是普遍的现象，也不是票据融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在谈到票据融资的监管时，潘功胜强调，人民银行作为票据融资市场监管的部门之一，下一步，一是要加强票据融资利率和资本市场利率之间的联动和传导，对于可能存在的套利和资金空转保持警惕，及时采取措施；二是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业务考核，发挥票据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防止有关行为的扭曲和风险的累积。

进一步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时指出，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在回应有关存款准备金率问题时，易纲表示，去年以来，人民银行5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共3.5个百分点，力度较大。存款准备金率将来会逐步转向三档——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二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的农村信用社、农商行为最低的第三档。目前，三档准备金率加权平均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1%。

“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比较中是中等的。”易纲说，发展中国家保持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合适且必要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降准还有一定空间，但这个空间比前几年已经小多了，在考虑降准时，同时还要考虑最优的资源配置和防范风险等问题。

在谈到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时，易纲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主要指的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实际感受到的融资成本比较高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一直在降低无风险利率。”易纲表示，通常我们把10年期国债利率作为一个基准利率，10年期国债利率在1年多时间内下行了70多个基点，从4%降至3.15%。

“但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感受到的融资成本，尤其是贷款实际利率还偏高，这主要是要解决风险溢价比较高的问题。”易纲介绍，去年，普惠金融口径单户授信在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较高，在6.2%左右，而不良率会反映在风险溢价上。

如何降低风险溢价？易纲认为，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来消除利率决定过程中的一些垄断性因素，更加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通过更充分的竞争，使得风险溢价降低；二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信息透明度、完善破产制度、提高法律执行效率、降低费率，从而降低实际交易成本，也会使得风险溢价降低。

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

易纲透露，中美在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

易纲表示，汇率问题一直是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双边和多边平台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都有讨论。中美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讨论由来已久，也不是第一次。如在以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框架下，都对汇率问题进行过讨论。

“这次我们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易纲举例说，第一，我们双方讨论了如何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时的自主权；第二，我们讨论了双方都应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的原则；第三，我们讨论了双方都应遵守历次G20峰会承诺，如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并且双方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沟通；第四，我们也讨论了双方都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来承诺披露数据等。“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易纲表示。

在谈到我国汇率改革时，易纲表示，央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汇率市场的波动和一定程度上的弹性对整个经济是有好处的。去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率是4.2%，而欧元的波动率在7%左右，英镑的波动率约8%。易纲认为，这反映了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汇率稳定不代表汇率盯死了不动。汇率必须要有弹性，有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才能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易纲表示，我们绝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也不会用汇率来提高中国的出口或者作为贸易摩擦的工具，我们承诺绝对不这样做。

新闻分析

□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前两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4.11万亿元——

实体经济融资环境延续改善趋势

3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5.3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05万亿元；前两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4.11万亿元，同比多增3748亿元。2月末，广义货币（M_2）余额186.74万亿元，同比增长8%。

“1月至2月综合来看，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仍显著回升。”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表示。虽然从2月份单月情况看，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为7030亿元，同比少增4847亿元，存量社融同比增速10.1%，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出现季节性回落。但综合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整体仍然延续反弹态势，实体经济融资环境改善趋势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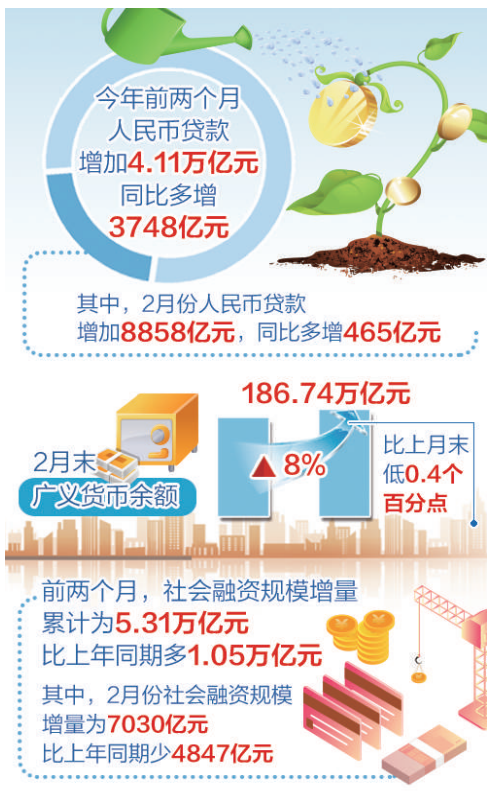
在3月10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1月份社融增速相对高一些，这明显是季节因素，所以要把前两个月的数综合起来看。社融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为2019年经济金融开局提供了保障。

“季节性因素叠加储备项目投放节奏影响，贷款延续历史规律，增量相对较少。”任泽平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2018年1月份新增贷款为2.9万亿元，是当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今年1月，新增贷款情况与去年同期情况类似，1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3.23万亿元，同比多增3284亿元。

2月份金融数据相对1月份回落也与季节性因素密切相关。任泽平认为，一方面，储备项目大多在1月份进行投放，留存到2月份的项目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今年2月份只有28天且包含春节假期，新增信贷规模本就相对较少。“但将1月至2月数据合计来看，较2018年仍多增3748亿元，实体经济融资环境仍在改善。”任泽平表示。

任泽平预计，今年一季度社融增速将继续反弹。一方面，2018年社融基数低，为2019年一季度社融增速回升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央行货币政策并非“大水漫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仍是关键，因此不会大幅刺激信贷投放。此外，社融分项方面，表内贷款仍是社融主力，2月份回落为季节性因素，3月份将反弹，但预计反弹力度不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M_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任泽平预计，2019年M_2和社融都将延续反弹态势。



经济界代表委员议政录

杨伟民委员：

我国经济基本面四个“没有变”

3月9日，杨伟民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杨伟民委员从四个“没有变”分析了我国经济基本面：

一是需求基础和供给条件没有变。我国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独有优势。只要我们善于从长期大势看当前形势，就不应该丧失信心。只要我们善于用市场化办法激发需求、优化供给，潜在的增长就会转化成现实的增长。

二是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变。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把握好战略机遇新内涵，并据此解放思想、重塑规则、改革体制，就能化危为机，把外部压力转化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没有变。只要我们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更多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市场经济的自我纠偏机制就会发挥更大作用，经济发展的韧性就会增强。

四是宏观调控精准施策的思想方法没有变。针对经济运行和政策执行中的突出问题，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作出了相应部署。只要我们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影响经济下行的短期因素就会不断消除，市场预期和企业信心就会增强。

林毅夫委员：

为中国经济投上信心一票

3月9日，林毅夫委员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表示，当前世界确实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任何变局都是“危”和“机”同生并存，应对得当将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

“展望今后，最重要的仍然是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林毅夫委员说，保持定力，抓住主要矛盾，找准改革突破口，就能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当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今后两年，降成本和补短板的发力空间巨大。

林毅夫委员认为，从降成本看，目前已开始为中小企业大幅减税。从补短板看，可补的方面还不少。我国当前产业多属中低端，可向中高端升级。其次，以往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城际间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和港口，但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地下管网依然不足，5G商业化运用带来新的投资契机，污染防治领域的短板也亟待补齐。我国仍处于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住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

林毅夫委员表示，只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胡晓炼委员：

坚持在发展中逐步化解风险

3月9日，胡晓炼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说，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当前金融工作的头等大事。要从营造维护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宏观环境、平衡好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关系、打好政策组合拳等方面入手打好这场攻坚战。

胡晓炼委员说，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易引发和放大金融领域长期积累的风险。这就要求财政、金融、产业等宏观政策稳字当头，保持定力，既要为防范化解风险创造一个平稳的大环境，又要对防范杠杆再次扩大、风险日后累加设置警戒线。

胡晓炼委员认为，防控金融风险不能以牺牲实体经济稳定为代价，不能以防风险为由，弱化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要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在发展中逐步化解风险。

胡晓炼委员建议，要针对不同类型风险采取差异化防控措施，风险防范和化解讲究的是策略和方法，不能简单化和一刀切。要一类一方、一户一策，设计好顺序和重点，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建立完善更加协调、中立的金融监管制度，监管需要加强法制和规则建设，保持监管尺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王一鸣委员：

聚焦结构性就业压力“稳就业”

3月10日，王一鸣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说，落实好“稳就业”任务，要聚焦结构性就业压力，关注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增强政策的针对性。

王一鸣委员表示，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产业调整升级，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趋突出，企业裁员和招工难、“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并存，部分领域、行业、地区就业压力更趋突出。

王一鸣委员建议，一是加大对重点行业的就业支持。对易受到外部冲击和去产能过程中面临困难的行业，采取加大稳岗补贴、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措施保障就业，同时发挥好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托底作用。

二是加强对重点地区的就业援助。加大对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地区的支持，通过促进创新带动就业、专项技能培训引导职工转岗就业、鼓励新业态发展吸纳就业等举措，缓解就业压力。

三是强化对重点人群的就业帮扶。通过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落户、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鼓励返乡创业等措施，稳定农民工就业。扩大高职院校招生规模，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四是增强民营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和活力，扩大就业容量和空间。

李彦宏委员：

构筑人工智能发展竞争优势

3月10日，李彦宏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表示，人工智能伦理将是未来智能社会的发展基石，要抓住人工智能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加快伦理研究和创新步伐，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竞争优势，早日建成智能社会，用技术造福百姓。

李彦宏委员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组织跨学科领域的行业专家、人工智能企业代表、行业用户和公众等相关方，开展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和顶层设计，促进民生福祉改善，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一是明确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统筹各方力量，加强相关研究，以老百姓的美好生活为终极目标，兼顾行业创新发展，明确人工智能在安全、隐私、公平等方面的伦理原则，制定人工智能伦理的指导性文件，对涉及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问题进行评估和指导。

二是强化领军企业担当，加快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落地。在信息推荐、自动驾驶、虚拟现实等热点领域，推进企业引领示范，在产品设计和业务运营中贯彻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让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和服务帮助人们成长，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三是加强国际交流，引领行业发展，凝聚全球共识。要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研究和制定，为国际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本报政协采访组供稿）